

女性研究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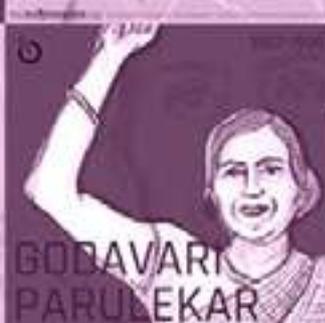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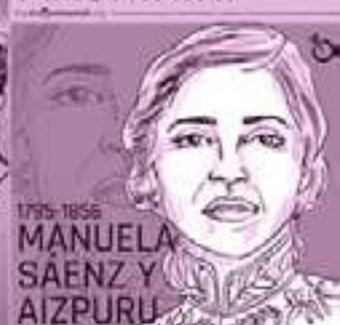


苦难的妇女 抗争的妇女

tricontinental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女性研究 | 1

苦难的妇女，抗争的妇女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19年3月



2018 年，阿根廷一名女子在“一个不能少”运动的游行队伍中。该运动组织了各种主题的活动，比如：性别暴力、堕胎及生殖权利、女性被害以及两性收入差距等。（Bárbara Leiva）

列宁在 1918 年表示, 所有解放运动的经验都证明了一个事实: 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妇女的参与度。一个多世纪后, 这一论断仍然适用于那些创建了革命运动、抵抗新自由主义运动以及最近抵抗反动民粹主义运动的妇女。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迅速启发了全球南方被殖民的农业大洲, 它燃起了一种希望: 占多数的劳工阶级可以打败占少数的剥削阶级。这个信念激发了群众斗争, 激励了世界各地的政治组织。20 世纪, 亚非两洲兴起了民族解放斗争, 而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则经历了依赖型增长的矛盾, 见证了其内部抵抗运动的兴起。妇女在这些斗争中无不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我们当下对保守新自由主义的凌厉攻势进行抵抗的时候,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出版了第一期《苦难的妇女, 抗争的妇女》。这是一份关于非洲、亚洲、美洲三大洲妇女斗争的介绍分析。新自由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对妇女施加了巨大压力, 她们首当其冲地成为危机、压迫、剥削的受害对象。

在《苦难的妇女, 抗争的妇女》系列文章中, 我们将讲述妇女斗争的故事, 她们不但为广阔的政治舞台贡献力量, 其中有些还率先创建了妇女组织, 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女权主义抵抗和斗争开辟了道路。

研究这些妇女的各种组织方法论是革命者的使命, 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她们的政治贡献, 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为今天的反剥削反压迫斗争建立自己的必要组织。

女性与不平等

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是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工人面临着来自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凌厉攻势。社会政治运动致力于抵抗政治分裂、经济不稳定、社会再生产能力衰减导致的后果。

这一剧变是近期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一个表现，资本主义的矛盾已愈演愈烈。政治、生态、社会再生产方面的矛盾动摇了经济基础，而经济试图通过非经济的关系恢复元气。正如阿鲁扎 (Arruzza)、巴塔查里亚 (Bhattacharya)、弗雷泽 (Fraser) 解释的：“在资本主义官方制度（雇佣劳动力、生产、交换、金融）的背后，有其必要的支持手段和成立条件：家庭、社区、自然；属地国、政治组织及民间社团；尤其是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无偿劳动力和应征劳动力，其中大量社会再生产劳动主要仍由妇女承担并且往往没有报酬。”（2019 年，第 64 页）

如果把这些挑战（以及败局）作为新金融化经济的起点，那么这些矛盾似乎是一些疑难问题的后果，比如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现象前所未有地加剧。乐施会 (Oxfam) 2020 年的最新报告显示，除了男女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少数人、少数企业手中的财富集中程度已创历史新高。世界最富有的 1% 的人口拥有的财富是 69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 92%）所积累财富的两倍多。全世界 22 名顶级富豪的财富总额超过了 6.67 亿非洲妇女的财富总和。

然而，剥削和压迫不仅出现在经济领域，还在社会、文化、道德价值观等范畴内得以延续，这些价值观都赞成阶级社会女性的守旧角色。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建构了社会关系的所谓男权制。工作的组织、分工、等级制度，加之家庭、国家、公民社会、社会再生产本身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都有助于维持这种状况，并与阶级和种族等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

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中男女劳动力的组织、架构方式必须理解为两性的劳动分工。这种工作结构不仅在男女之间分配任务，还创造了一种认为男性劳动比女性劳动高贵的等级制度。这种结构促进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分离，只把经济生产领域的劳动视为“工作”：一个主要由男性占领的空间。与此同时，它将属于生育、照料、家庭、家务的空间单独区隔开来，这些事务变成了“非工作”或几乎不被认可的工作，而且（大部分）是没有报酬的，在社会上也遭到贬低。



根据乐施会的说法，低收入工作主要由妇女从事。妇女承担了全世界 75% 以上的无偿照顾工作。妇女和女童每天从事无偿工作的时间约为 125 亿小时，或照顾老人，或照顾家庭（来源：乐施会 2020 年）。结果是，由于超负荷的家务劳动，全世界 42% 的妇女被排除在了劳动力市场之外（相比之下，只有 6% 的男性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

这一巨大差距源自一个轻视女性的、充满缺陷的经济体系，它把女性置于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纷争中心。妇女是首先感受到这场危机后果的人群，危机导致她们工作不稳定、工资水平下降。社会保障制度、儿童教育（日托）、老人护理等关键社会救助制度等因新自由主义的最新进展而恶化，这些制度的崩溃也给主要靠妇女维持的“关爱经济”造成额外负担。此外，妇女遭受暴力已成为常态，全世界每年有 9 万多名妇女被害，大多数案件发生在她们自己家里，即属于家庭暴力。

反抗与斗争

新自由主义政策分裂了社会，分割了政治场域，使之难以形成统一的抵抗力量。在这个关头，有人认为，反动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和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潮不可能有其他替代方案；其他任何道路，比如社会主义道路，都被刻意隐匿了。在这种隐匿的背景下，我们尤其要铭记历史上的解放运动，重视当前发动群众进行抵抗活动的启示。

面对残酷的压迫和暴力，妇女作为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经济剥削最早、最严重的受害者，在当今日益加剧的全球社会动荡中一直处于最前沿。她们仍是亚非拉三大洲社会斗争的中坚力量，大批妇女参与了这些反抗活动。

在本创刊号中，我们特别关注了全球南方进步的、女权主义的群众抵抗进程，并在贯穿二十世纪的女性斗争的启发下确定我们这个时代斗争的主要特征。

拉丁美洲保守主义时期的妇女斗争

在拉丁美洲，通过选举，通过各种形式的政变，转向右翼的改变发生了。右翼势力的回归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计划在该地区加速推行。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政策，包括大幅削减教育、健康和社会援助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以及对主要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私有化。在左翼暂时占优之后，保守派又重新掌权，并立即转向紧缩政策，家庭妇女和职业女性受到的剥削都加重了，风险也加深了。

与此同时，该地区的保守活动与日俱增。右翼组织和宗教团体打击有利于女性和 LGBT 群体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在学校课程中去除“性别”一词以及限定堕胎的合法途径。右翼通过社交媒体和媒体机构对其所谓的“性别政治”进行穷追猛打。这一趋势在中美洲和秘鲁更为激烈，但在整个拉丁美洲都有发生，并有可能损害几十年来的斗争成果。

关爱经济遭到削减，妇女权利受到诘难，种种遭遇激化了妇女的情绪，促使她们动员起来，加入世界各地的进步组织。越来越多的女性呼吁，要在建设新世界的斗争中采用重视女性视角的新模式。这种对新世界的诉求产生于反抗男权式结构调整政策的经验。

资本主义倾向和新自由主义浪潮令性别分工、性别暴力及压迫的后果愈加严重，妇女受到的剥削也更加猖獗。这反过来加速推动劳动妇女组织起来，包括土著、黑人和无地妇女，她们已经转而反对新自由主义，甚至转向了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的情况正是如此。

妇女遭受的性别暴力和压迫体现在，国家扩大了对性取向以及妇女生育权的限制【由席尔瓦·费德里奇 (Silva Federici) 提出的理论】。政府企图控制女性身体的做法引发了世界各地妇女组织的抗议，比如在阿根廷，妇女争取堕胎合法化，她们手拿具有象征意义的绿手帕涌上街头。

在玻利维亚，2019 年发生了反对埃沃·莫拉莱斯 (Evo Morales) 及其“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 (Movement to Socialism, MAS) 的政变，而妇女在反对这场政变的抗议活动中成为了中坚力量。自政变以来，执政的政府羞辱并迫害土著人民以及全体农民。除了恢复原政府的呼声，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妇女抗议活动还要求解放妇女和土著人民。



在巴西，在反工人党政府的政变发生后，大批妇女行动起来。2018年9月著名的“不要他”（Ele Não）游行是巴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数千名男女在该国114个城市上街游行，反对日益严重的轻视女性行为，反对极端保守的候选人贾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竞选活动。

2019年，在博尔索纳罗的总统任期内，压迫、威权、道德守旧等现象加剧，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急剧上升。在博尔索纳罗上任第一年的上半年，该国最大城市圣保罗的女性被害案件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44%。在这个每四秒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到殴打的国家，用于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公共政策投入从2015年的1.19亿雷亚尔（仍在工人党政府领导下）下降到博尔索纳罗掌权后的2019年的530万雷亚尔（注：雷亚尔是巴西货币，目前1雷亚尔约等于1.17元人民币）。同一时期，妇女、家庭与人权部将援助暴力受害妇女的预算从3470万雷亚尔减少到194700雷亚尔。对日托和学前教育的投入也大幅下降，目前处于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建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预算从2014年上半年的逾5.06亿雷亚尔下降到2019年同期的1020万雷亚尔。冷落现象日趋严重，预算削减日益增多，直接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继而导致政治、社会、文化保守主义及专制主义扩大，将对该国妇女反抗及动员的水平提出新的要求。

在智利，女权主义斗争近年来发展迅速。这一点体现在了201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斗争中。尽管这一斗争通常就是大型的示威活动，但其规模迅速扩大了。除了规模，该妇女运动还通过创建8M女权主义协调组织（Feminist Coordination of 8M）巩固了其组织力量，该协调组织与其他组织一起，于2020年1月举行了第二次多民族斗争妇女会议（Second Plurinational Meeting of Women in Struggles）。三千多名女性和LGBT人士聚在一起讨论这一计划，为当前形势规划出路。

这场行动始于2019年10月18日并仍在进行，智利妇女走上街头，为国家的制度变革而斗争。他们受到警察和军队的残酷镇压，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政府领导的警察和军队盲目地保护资本及其政治代表的利益。抗议与镇压期间，恶劣的、蓄意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警察的性暴力。该女权运动通过女性团体“命题”（Las Tesis）表演的歌曲《强奸犯就是你》（The Rapist is You）控诉了这种暴力行为，这个表演在世界各地得到响应，有了多个语言版本。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独裁统治造成的生存危机一直持续至今，智利的女权运动是与反对这一危机的其他社会政治运动同仇敌忾的。智利的一个主要斗争是



2018年9月29日，巴西爆发了本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游行，全巴西亿万妇女、革命斗志及社会运动向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发出“不要他”的呼喊。（维基媒体 Sãmia Bomfim）

捍卫旨在破除新自由主义、保障人民政治参与权利的宪法进程。这场斗争的一项内容就是要在该宪法进程中推进性别平等。

在委内瑞拉，正如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 (Roxanne Dunbar-Ortiz)、安娜·马尔多纳多 (Ana Maldonado)、皮拉·特罗亚·费尔南德兹 (Pilar Troya Fernandez)、维杰·普拉沙德 (Vijay Prashad) 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的，玻利瓦尔革命的主要捍卫者是女性。妇女参与了委内瑞拉的革命进程，在重建数十年来被资本主义紧缩政策侵蚀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发展群众力量、建立参与型民主方面，她们的付出是至关重要的。3186 个公社的发言人中有 64% 是妇女，48160 个公社委员会的大多数领导人以及本地供应及生产委员会 (Local Supply and Production Committees, CLAP) 中 65% 的领导人也是妇女。妇女不仅在工作场所要求平等，在社会领域也要求平等，而社会领域中的公社是玻利瓦尔社会主义的构成因子。妇女在社会领域一直在努力争取自治和双重政权，以逐渐侵蚀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体系。

拉丁美洲目前的斗争和抵抗必须围绕妇女及她们分析讨论建设新世界的诉求进行。

莫迪政权下印度女性的处境

自 2014 年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当选总理以来，印度人民党 (Bharatiya Janata Party) 及其印度教亲信组织对于少数派和进步力量的仇恨言论日益猖獗。右翼势力试图通过这种引发仇恨的行动来破坏印度的社会结构，并按照其分裂性意识形态进行重建。不仅反对这一企图的人都受到暴力威胁，全社会都笼罩在普遍暴力的阴影中。可怕的是，右翼团体及其打手却能逍遥法外。妇女在该国的暴力气氛中是最严重的受害者。

自 2014 年以来，印度各地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尤其是性暴力明显上升，令全印度妇女心生恐惧和愤怒。今年，这一现象也许在北方邦 (Uttar Pradesh) 最为明显。北方邦是印度人民党社区政治的中心，该政治主张的根本议题是按照宗教、种姓等身份划分社会。就在这个邦，号称“神之使者”的首席部长尤吉·阿迪佳纳特 (Yogi Aditya Nath) 成了印度

人民党领袖，他决心在该邦建立自己版本的印度教之邦 (Hindu Rajya)，利用国家机器恐吓穆斯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连政府也在邦议会坦承，自阿迪佳纳特就任北方邦首席部长以来，针对妇女的犯罪增加了 33%。一名年轻女子惨遭人民党议员性侵的事件就是印度人民党统治下妇女遭受暴行的典型体现。这名年轻女子勇敢地向警方告发了该议员后，她的父亲在警方拘留期间受尽折磨而死。她坚持法律斗争，一辆卡车离奇地撞上了她与家人和律师同乘的汽车，两名家人在事故中丧生，她和律师受重伤。

当妇女主张权利时，印度教势力就对她们进行严厉的暴力压制。多年来，女性活动家一直在争取获得进入喀拉拉邦名寺——萨巴里玛拉寺的权利，2019 年，印度最高法院最终认定女性有权进入该寺庙。印度人民党的国家领导人和中央部长们对经期妇女进入神庙的权利表示谴责，认为这是对神庙的亵渎。更有甚者，当喀拉拉邦的左翼民主阵线 (Left Democratic Front) 政府实施这项权利时，印度人民党等右翼组织网罗暴徒袭击到访寺庙的妇女，并在全邦范围内大肆闹事，反对妇女进入萨巴里玛拉寺庙的权利。

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视女性为从属物、维护种姓制度的印度教男权制。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所描绘的女性被称为巴拉特马塔 (Bharat Mata, 意为“印度母亲”)，她象征着国家荣誉。关于巴拉特马塔受到国内敌人 (即穆斯林) 威胁的谣言屡见不鲜，它被用来按宗教身份分化社会，并被用于政治动员。印度人民党允许女性加入并非是因为男权制规范体系瓦解了，也不是为了挑战男权制，而是基于印度教的意识形态和印度教国家的框架。印度人民党的母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要求妇女谨守贞洁，并应成为社区荣誉的象征。国民志愿服务团通过寺庙和妇女中的“虔诚之歌” (Bhajan) 团体掀起了一波追捧迷信和仪式的宗教狂热。印度教右翼组织正在通过这些团体动员劳动力，而且极右势力正在变本加厉地动员妇女做着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根据周期劳动力调查 (Periodic Labour Force Survey)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的数据，在过去几十年中，适龄劳动妇女中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目前这一比例为 23%。

许多右翼分子有一个谬论，即女性之所以待在家里而不去找工作，仅仅是因为男性赚得更多。殊不知这其中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机械化 (还有其他原因)，而农村就业机会是农村妇女就业的主要来源。虽然男性通过季节性迁移以及长期迁移在城市地区寻找工作，但这一过程对女性来说更为艰难。对女性来说，当她们被迫离开自己的社区时，照顾孩子的责任永远更为繁重。妇女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这一现实使她们尤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远离社区的地方，妇女很难找到安全的工作场所。对于与家庭一起迁移或者已在城市生活的女性来说，昂贵而耗时的通勤 (这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现实问题) 给她们造成了额外挑战，因为她们经常独自挑起照顾孩子、做饭、清洁等家务的重担。





2019年1月1日，喀拉拉邦妇女墙。喀拉拉邦550万妇女动员起来，捍卫性别平等以及喀拉拉邦的复兴价值，反抗右翼势力的打压。这堵人墙自北向南横贯全州，共涵盖620公里。

印度人民党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妇女的工作条件，例如：同工同酬、在工作场所设立托儿所或是确保零骚扰的安全工作场所。相反，它倒行逆施，削弱女性通过几十年的斗争获得的自由，让她们再次变成宗教荣誉和身份的卫道士。

然而，对妇女权利严重的、持续不断的侵犯在全国各地遭到大规模抵制。妇女正在领导着一场反对公民权利修正案 (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国家公民登记法 (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国家人口登记法 (National Population Register) 的运动，因为这些法律本质上违背了印度宪法的条款。从德里的沙欣巴格 (Shaheen Bagh) 到各个小城镇、城市、地区、村庄，妇女都站在运动的前沿，反对人民党带头侵犯公民权的行径。

南非自种族隔离以来的抵抗和斗争

在南非，妇女在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1954年4月17日，南非妇女联合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它通过了一项妇女宪章，把妇女解放作为争取公正未来的核心工作。几年后的1959年，多萝西·尼姆贝 (Dorothy Nyembe)、弗洛伦斯·姆希泽 (Florence Mkhize) 作为德班卡托庄园棚屋起义反抗的主要领导人而崭露头角。在1973年德班罢工运动及黑人工会运动重启之后，贾布·恩德洛武 (Jabu Ndlovu)、艾玛·马什尼尼 (Emma Mashinini) 等妇女成为工会运动中的重要角色。上世纪八十年代，妇女在以社区为基础的斗争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斗争往往以统一民主阵线的名义开展。

一个知名的白人女权主义学术流派经常指出，如果女性参与的斗争与广泛的民族解放斗争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则不应视其为纯粹的女权主义。诺博尼索·加萨 (Nomboniso Gasa) 是一位勇敢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也是一位重要的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她在2007年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驳，问道：“为什么一方面要在黑人斗争和解放斗争之间筑起隔离墙，另一方面也要在女权主义之间建起隔离墙？”历史已经给出了这场辩论的答案。参加种族、性别、阶级等相关斗争的妇女不再被排除在真正女权主义者之列。



然而在种族隔离之后，以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取代了群众组织，作为这一基本进程的一部分，女权主义经常成为一种职业，主要分布在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中。草根阶层或者群众中的女权主义很少被认为是女权主义，即使它们以反叛的形式出现。这类职业女性主义的关注点往往在于改变法律政策，在精英体系中获得话语权。当然，也有一些重要例外，包括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争取治疗行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前后所做的工作——为获得药物治疗而进行的斗争，包括对公众政治赋权的重点关注。2009年，随着迷恋男权的祖马（Jacob Zuma）登上总统宝座，职业女权主义的局限性凸显出来。祖马的执政得到了来自左派、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中受到动员的妇女以及选民的广泛支持。在政策、法律、精英代表方面，女权主义的进步与建立群众力量、塑造社会共识方面的进步并不匹配。

如今，南非的暴力犯罪率惊人，包括对妇女的性暴力。反对这一危机的要求有时表现为：要求恢复死刑、暂停法治乃至要求男性“保护”女性。在某些地区盛行的大众女权主义在精英公共领域、学术界、非政府组织中仍然遭到冷落。然而，并非南非的所有斗争都被“非政府组织化”的社会斗争所吸收。从这个意义上说，Abahlali baseMjondolo 是当代大众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例子。Abahlali baseMjondolo 是一场占屋运动，也是自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该运动中女性占大多数，不少女性处于领导地位，经常用妇女政治赋权的话语提出女权主义问题。

与巴西、印度等国不同，南非没有持续性的全国妇女运动，这种运动将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如律师和记者）与活跃在社区组织、社会运动、工会中的妇女联系起来。建立这样一种联系不仅对南非来说是当务之急，对于整个非洲大陆乃至在团结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方面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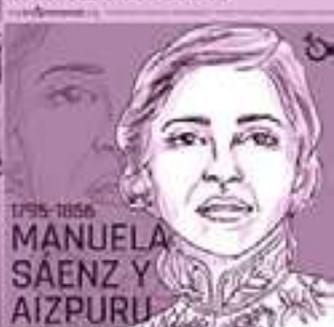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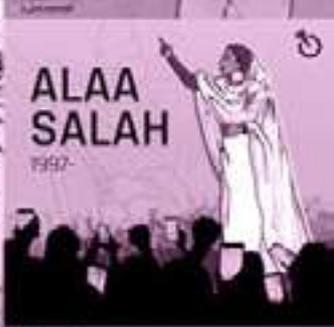
2018年9月29日，巴西爆发了本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游行，全巴西亿万妇女、革命斗志及社会运动向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发出“不要他”的呼喊。（维基媒体 Sãmia Bomfim）

创造、力量、团结

在世界各地反对紧缩政策和资本主义的活动中，女性展示了她们的创造力、力量、团结。她们不仅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及日益增长的保守主义，而且还支持社会主义实验。考虑到这些进程相似，妇女正在创造各种替代方案，促进国际间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从这些例子中清晰可见，女性不仅参与了这些斗争，而且在其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正是这种参与和领导保证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观点被纳入革命进程。





参考文献

- Lenin, V.I. 'Speech at the First All-Russia Congress of Working Women, November 19, 1918'. Lenin's Collected Works,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Volume 28, 1974, pages 180-182. First published: 22 November 1918, Pravda No. 253.
- Cinzia Arruzza, Tithi Bhattacharya, and Nancy Fraser. *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 Brooklyn, New York, Verso, 5 March 2019.
- Federici, Silvia.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Brooklyn,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4.
- OXFAM. *Time to care: Unpaid and underpaid care work and the global inequality crisis*. 20 January 2020.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
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